

本报记者姜伟超

前几天,记者在西部某省和一位乡镇党委书记进村调研农村养老问题时,被几户村民“围攻”了。

山里的冬天干冷,阴了一上午也没下雪,直到太阳偏西才憋出一小点雪粒。记者和这位乡镇党委书记从镇上出发,在山上开车绕了一个多小时,来到了一个位置逼仄的村子。

下车后,记者正弯腰取设备,感到后面有人拽,回头一看是一位40多岁的大姐,人粗壮,脸上带着常年日晒形成的暗红色,嘴唇干焦。

“什么时候给俺家放贷款?”这位大姐直接冲我来了,一句,语速很快,音调有些惑。记者一愣:“大姐,我不是银行的,放什么贷款?”

“我知道你不是银行的,镇上的(干部)吧?!凭什么别人有,到我家就没了,还讲不讲公平!……”大姐有些激动,一只手抬起来作势要抓住记者的衣领。

记者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,拿眼睛一扫,只见那位镇党委书记站在几十米远的地方,盯着晾晒在木架子上的甜荞麦出神,一副“我不认识你”的样子。

大姐的语速越来越快,正当记者手足无措的时候,村上的支书匆匆赶到,大姐立马调转火力,冲着支书骂了起来。村支书一开始还争辩几句,后来干脆不再回嘴,低下头只管抽烟。

记者在一边站了半天,才大概听明白了。原来,这位大姐一家4口人,3个劳动力在外打工,日子还可以,但去年底家里因病返贫,今年被认定为精准扶贫户。

以前的精准扶贫户除了享受精准扶贫政策以外,还有5万元的精准扶贫贷款,政府贴息。这个精准扶贫贷款政策是省上2015年开始实施,到2016年全部发放完毕,今年精准扶贫贷款的政策没有了。乡镇和村上的干部多次讲解政策,但这家人一直想不通,在村上、乡镇上见到干部就反映。

趁着村支书顶在前面,记者得以脱身走访了几户特困老人。两个小时过去,回到车前一看,人更多了。镇党委书记说破嘴皮子,大家的回应就是6个字“不公平”“不相信”。

天擦黑了,雪越下越大,大家逐渐散去,镇党委书记和村支书被骂的一脸颜色。往回走的车上,记者和镇党委书记有了一番交谈。

“你们乡镇的干部经常挨骂吗?”“也不是,这个村是特困村,我和镇上的干部每周都要来入户,村民主动管饭”。

“那大家怎么不给你留点情面,说骂就骂?”记者问。镇党委书记望着车窗外的荒山,过了一会答非所问地说:“其实大家都知道政策变了,但5万元是几年都挣不来的大钱……”

镇党委书记说,每每遇到这种导致“一样人两样对待”的政策变动,必然挨骂,基层干部挨的骂,一多半是由政策变动导致的。

记者忽然记起,2015年到另一个省份采访,和一位乡实地调研易地搬迁扶贫,被多位村民追着反映搬迁补贴问题。当记者停下脚步拿出笔记本,村民呼啦围了上来,一致声讨乡镇领导和村上的干部处事不公。

村民反映,去年和今年乡上对村子进行分批扶贫易地搬迁扶贫,但只有第一批搬迁户补偿款是4万元,剩下的几批都只有2万多元。村民越想越觉得这里面肯定有猫腻,于是到处“要说法”,也越来越不给乡上和村上的干部好脸色,见了面搭个腔活里都带着刀子。

那位乡长在旁边定定地听着,一脸苦笑。等村民说完了,乡长才走上前来,当着村民的面跟记者道出原委。

原来,这个村由于居住分散,户多人多,加上很多村民对搬迁后的生产生活心里忐忑,迟迟下不了搬迁决心。于是乡上就先动员了村上最困难的几户,作为第一批搬迁下山,当个示范。2014年第一批搬迁户搬迁时,省上国土厅有一个专项,对贫困户危房改造进行补贴,每户1.5万元,每个乡镇名额有限。乡上考虑到这个村子贫困程度深、搬迁任务重,就把名额集中使用到第一批搬迁户里了。

转过年这个专项没有了,但村民不相信是政策变动钱没了,都认定是乡上有钱不给,故意“看人下菜碟”,觉得背后有“黑幕”,拿到4万元补贴的肯定是“走了关系”。

“这个村家家户户穷富差不了几毛钱,但补贴差了一万多,这事调在谁头上都不容易接受,但乡上确实没办法,专项不用上面要追查,用了就要挨骂。”乡长说。

记者在下乡调研时,发现基层干部因政策变动挨骂的情况并不鲜见。许多县、乡、村的领导干部告诉记者,像精准扶贫这样的大战役,涉及的人数多,地区广,时间跨度大,地方的政策设计一定要长远,要有持续性,政策红利只可增不可减,一旦有中断或者取消,造成的基层矛盾严重影响干群关系和工作推进。

眼下,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满打满算还剩下2年时间,但有些地方还政策天天变、标准左右摆,耗虚功,瞎折腾,不是在发展致富产业、解决实际问题上下功夫,而是从统计学上找捷径,日夜不停改数据、报材料,不仅让干部深陷其中,精准扶贫户也“见表色变”。

记者前段时间到一个贫困地区采访,有些包村干部告诉记者,因为上面政策经常变,上面一变,各种报表、统计就得重新做,都需到贫困户家里重新测算,有的贫困户烦不胜烦,对干部印象也逐渐变得不好,认为干部是在搞虚的,不扎实,不是真心想帮助脱贫。

“你相信吗,有一次我去一户贫困户家里入户,大门关着,我就在他家院墙外打电话,听着院里电话响,接通了我就问你在家吗,电话里竟然说我不在。”一位驻村干部尴尬笑着说。

“省上领导是贵人,县上领导是好人,乡镇领导是坏人,村上上干部不是人。”这个顺口溜记者在多地听干部和群众说起。其中蕴含的东西值得细细品味,时时警醒。

基层干部为啥易挨骂

评论

“西方向右”,静水流深



解国记
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

没有2016年特朗普胜选和英国脱欧两大“黑天鹅”的冲天之飞,度过了2017年春天让人提到嗓子眼的法国马克龙险胜勒庞的选战,人们大松一口气,以为欧美等西方国家右转浪潮的抛物线顶点已过,“右翼势力遍地开花的美梦已经破碎”,西方的“民粹主义已经退潮”。

然而,2017年12月,奥地利右翼政党自由党进入内阁参与执政,一下子让人意识到:“西方向右”之潮不过是由惊涛骇浪转为静水流深,病非“瘰理”,医治不易。

民粹政党得位

民粹民众趋多

虽然大选未能最后获胜,但欧洲不少民粹政党的地位、阵营、地盘,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。民众中民粹主义选民基数也有增大的迹象。这是土壤和“根据地”性质的扩张。静水流深,比浪花、比波涛更具稳固和持久性。

最具典型性的,是上面提到的奥地利自由党。这个著名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,不但进入内阁,而且执掌外交部、国防部等关键部门,领导人施特拉赫还出任了该国副总理,成为西欧唯一有极右翼政党参与执政的国家。

最有代表性的是德国。默克尔虽大选获胜,但前期结果坐定:她要组阁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,基民盟/基社盟、自民党和绿党联合组阁。而这个联合,可以说是难上加难。果然,默克尔与自民党、绿党三方的谈判,已于2017年11月19日破局。若自民党持续拒绝与保守派共治,那么,德国就可能成立少数政府或重新举行大选。德国的这个僵局,实在不是什么好兆头。

其实,早在2016年3月,3个重要联邦州议会选举中,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就已“失守”2个,右翼政党在3个州议会中均获席位。2016年9月,在梅克伦堡—前波莫瑞州

议会选举中,默克尔的基民盟又败给右翼的选择党(又译选项党)。三党派谈判破裂危机将持续多久,后果如何,殊难预料。但其组阁危机的结果无论如何,都是右翼民粹主义的选择党最高兴的事情。即使将来有了定局,选择党也铁定成为下届联邦议会里的主要政敌——右翼选择党首次晋身国会成为第三大党,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情。

法国的大选,也不能只看那个“胜王”马克龙。如果清点一下票仓就会知道:作为反体制的候选人勒庞和梅朗雄,拿下了超过43%的选票;还要知道,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早在2015年5月,就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了25%的选票和24个议席,超过社会党和共和党这两大主流政党。2016年,最大在野党共和党等中右派初选中,前总理菲永获胜。紧接着,极右的国民阵线主席勒庞,也成为2017年总统选举人选。这都表明了右翼民粹主义社会基础的支持度,支持者不会因为菲永、勒庞没选上总统就销声匿迹。

北欧方面,在瑞典和丹麦这样传统上好客的国家,反移民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。瑞典极右翼政党民党早已是议会第三大党,丹麦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丹麦人民党是议会第二大党。西北欧的荷兰右翼政党也在兴起。

中东欧地区,反对一体化和分裂迹象也很明显。捷克亿万富豪安德烈·巴比什,在大选中以在难民问题上对抗布鲁塞尔“命令”等主张获胜。从欧尔班·维克托统治的匈牙利到法律与公正党执政的波兰,与捷克有很强相似性——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突然掀起了反抗布鲁塞尔的“暴动”。

民众方面,2017年10月15日奥地利国民议会选举结果:中右翼的人民党以31.6%的选票胜出,极右翼的自由党得票率为26%,两者合计高达57.6%——奥地利半数以上的选民“右转”了。荷兰大选中,反移民运动领导人海尔特·威尔德斯虽然败选,但其得票数却高排在第二位,同样显示支持右翼政党的选民意愿。奥地利前副总理布泽克说,整个欧洲的政治氛围右倾趋势明显。

新纳粹、白人至上

另类右翼线上线下联动

2017年8月19日,德国首都柏林爆发了两场相互对抗的示威游行。新纳粹主义者居然堂而皇之地上街游行,同时还有差不多数量相同的民众,也举行了反新纳粹主义的示威。据CNN援引警方人士的话称,数百名新纳粹主义者在柏林街头举行示威游行,纪念纳粹党二号头目鲁道夫·赫斯去世30周年。赫斯曾担任纳粹党的“副元首”一职,在二战后进行的纽伦堡审判中,赫斯以破坏和平罪和密谋罪被判处终身监禁。他于1987年在德国柏林施潘道监狱自杀身亡,是纽伦堡审判的22名被告中最

后一名离世的。赫斯死后,成为德国新纳粹主义者的崇拜对象。

如果说这只是少数极端分子的行为,那么此前一周的8月11日至13日,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游行和骚乱,则是近年来美国规模最大的“白人至上主义”行动。11日晚开始,美国数以千计的白人种族主义者,在夏洛茨维尔市聚集游行。12日,反对者也组织集会,与这些白人种族主义者在街头对峙。当天上午,双方的对峙由口角相争升级为暴力斗殴。暴乱中“白人至上”主义者举着火炬游行,并高喊颇具纳粹色彩的“鲜血与国土”的口号,游行中还出现了多面纳粹旗帜。他们声称,白人正在丧失在美国的主体地位,呼吁白人联合起来对抗少数族裔。暴乱分子的诉求非常明确:白人至上。而在美国,无论是“白人至上”主义、新纳粹思潮还是反犹太人言论,传统上都认为是站在美国价值观对立面。

柏林的新纳粹主义堂而皇之上街,夏洛茨维尔市的大规模“白人至上”暴乱,都是借助了社交媒体,线上线下联动突然聚集而成的。

不能不警惕的是,如果某个右翼思想、战术或点子在一个环境下被证明是成功的,那么它很可能会出现在其他环境中。

“涡轮民主主义”

让政客们在右转中难以自拔

上世纪末美国学者爱德华·勒特韦曾提出“涡轮资本主义”说,指资本主义带来创新、效率、飞速前进的同时,也带来各种社会问题。这种社会就像快速涡轮发动机一样,每个人陷于其中却身不由己,几无调控条件等纠偏制衡手段,难以防止社会动荡。

德国《明镜》周刊专栏作家亨里克·弥勒,有可能受爱德华·勒特韦“涡轮资本主义”说影响,提出了“涡轮民主主义”,大致是指西方政党、政客,在近两年快速蔓延的民粹主义冲击中,在西式民主、票选代议制和网络社交媒体的牵制、裹挟中,已经身不由己,难以自拔,只能随波逐流,甚至主动靠近和助推右势。

亨里克·弥勒称,我们正在经历西方民主国家的根本结构变化。几年前占主导地位的还是稳定的政治寡头垄断;民意决定于几个人民政党、工会、协会和制造舆论的少数报纸及广播机构。它们共同塑造了舆论并决定政治议程。这种情况已经成为过去。政治市场变得有争议,通过脸书网站和推特网站,抗议运动在很短时间里就能聚集起来,新组织得以形成。

“涡轮民主主义”带来两大明显问题:一是不稳定性。传统政党所做之事——引导舆论、形成靠谱政见、培养政治精英——看似单调且具有限制性,但它们也创造了稳定和可靠。而所谓的民意,则会突然带来无规律转折

人中仅4人经抢救后幸运脱险。

远水解不了近渴,当下倘若寄希望于影视剧制和播出上反思自我约束,显然不现实。那么,父母需要做的就是,要让孩子远离这些影视剧(这样很难),要么加强教育,及时予以必要的告知解释,加强儿童自我防护。毕竟,不可能让孩子生存在一个真空的玻璃罩里,只能让孩子们在被现代传媒包围的复杂环境下,形成足够强大的心理免疫,避免悲剧发生。

比如,近期好评如潮的动画电影《寻梦环游记》,其实试图消解成人对死亡的恐惧,但这种对死后世界的美化,也暗藏着杀机。大家在热烈地讨论着影片的精彩时,有没有借机对自己的孩子进行有关死亡的必要的警示教育呢?

除了影视作品导致的儿童幼稚型自杀以外,其余的情况更为复杂。比如有学者认为,目前自杀的低龄化趋势和我们的竞争低龄化有关,许多家长过早把孩子们放在一个成人成功的模具里面,使孩子们也在各种竞争中苦苦挣扎,倍感竞争压力。

其实,天生我材必有用,三百六十行,行行出状元,怎么可能所有孩子都是传统意义上的高材生呢?为什么家长不能接受一个平庸但健康的孩子呢?我有个年轻校友,有一次在单位被领导训斥了一顿,回到家里诉苦时,家长非但没有安慰,反而又数落了其一顿。结果,他选择了跳楼,被救起紧急送医院后,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了7天,终于不治而亡。

如果只从这一件事上来看,这一自杀行为显得有些不可思议,不就是挨了两顿骂么?但当我知道了这个年轻人的成长经历之后,就明白造成这一悲剧发生的原因远不那么简单。

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,原来,他的爷爷是我校当时唯一的一位院士,其父母这一代也多是成就不俗的科研工作者,可这孩子打小就学习不好,最后连医科大学也是靠关系才进去的。本科毕业之后,他既未从事基础医学研究,也没当上临床医生,而是进了一家大医院做了行政人员。对于中国绝大多数普通的家庭来说,这其实也算不坏的去处了,但就他的家庭而言,则显然不符合父母的预期——太没出息了。

我们不知道他在成长过程中经受过怎样的压力,不知道他当天是如何被责骂的,也不

消除少年自杀隐患,根在家庭

对湘潭“双面少年”跳楼事件的思考

李清晨(儿科医生)

日前,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刊发独家调查报道《湘潭:“双面少年”跳楼事件始末》(2017年12月29日,扫描文末二维码可阅读),详细还原了湘潭凤凰中学17岁少年跳楼死亡事件——2017年12月23日晚,17岁的小凯在被老师批评之后,分别给班主任、家人留下两封遗书,在黑板上写下了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,从五楼一跃而下。

如果不是这一跳,小凯大概也会像我一样,嘲笑朋友圈那些在年末晒18岁旧照、追忆青春岁月的中年人。可惜,他再也没有机会走过18岁了,更没有机会成为“油腻的中年人”,他失去了未来一切庸常岁月,一切可能的美好……

不过,他也不必遭受成人世界的粗鲁。小凯在写给班主任的遗书中说:“作为一个老师,你动手打学生;作为一个老师,你在不经学生同意的情况下,翻学生私人物品,侵犯其隐私权……”那一刻,对于小凯来说,老师粗鲁的批评和体罚,可能就是他不可承受的羞辱。但如果他熬过那一刻,继续往前走会发现,人生路上,这样的事情算不得什么。

调查记者将这一事件描述为“师生冲突”,大家都知道9月10日是教师节,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,这一天也是世界预防自杀日,结合这个悲剧事件,这个日子的重合颇有些酸楚。

世事无常,人生多变幻,有关自杀的新闻近些年不时见诸报端。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材料,全球每年有100万人自杀,每40秒就有一人死于自杀,每3秒就有一人自杀未遂。生命可贵,自杀,总是一个沉重、灰暗的话题,儿童及青少年的自杀更是社会与家庭不可承受之痛。

因为这一惨痛的现象多属偶发,远未引起社会及多数家庭的足够重视,甚至有时候当悲剧都已确实实实在在地发生,有些家长仍感到不可思议,认为是孩子在开玩笑,孩子会回来的,但孩子真的永远也回不来了。尚未成年的小凯,没有跟老师和家长开玩笑,他以决绝的方式,将自己的年龄永远定格在了17岁。

一份国内儿童自杀研究的数据显示,中国每年自杀身亡的儿童人数大约为2583人(据正式的报告及数据推算),实际的自杀人数可能还要更多一些,因为许多人认为自杀是不光彩的事,或有些人害怕承担责任,因此许多家庭和